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

文化视野下的 变译研究

WENHUA SHIYEXIA DE BIANYI YANJIU

张永中◎著

013043658

H059
209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

文化视野下的变译研究

张永中◎著



H059
209



北航

C1647235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野下的变译研究/张永中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 - 7 - 216 - 07464 - 3

I. 文…

II. 张…

III. 翻译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460 号

文化视野下的变译研究

张永中 著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鄂州市信谊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2.25

字数:212 千字

插页:1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464 - 3

定价:3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总 序

说起大学，许多人都会想起教育家梅贻琦校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大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

大师的成长，当然离不开种种主客观条件。在我看来，在诸多的因素中，一个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就是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充分展示与交流。纵观历史，凡学术繁荣、大师辈出时期，必有一个做学问者有可以互相炫技、彼此辩论、各显神通的大舞台。古代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离不开当时的客卿、门客制度，为不同的观点、流派彼此公开竞争并得到君主的采纳搭建了平台；学者阿英在论及晚清以来中国新思想、新艺术的繁荣时，列举了三条原因，其中的第一条原因“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的产生”。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社团与杂志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18年，《北京大学月报》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加之《新青年》、新潮社等杂志、社团为师生搭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大舞台，开启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辉煌。国外名牌大学的发展，无不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思想的激烈交锋、学术的充分争鸣，并且这些交锋和争鸣的成果都得到了最好的展示与传播，没有这些交锋与争鸣，就没有古老的牛津、剑桥，也没有现代的斯坦福、伯克利。近代以来的印刷技术、新的出版机制、文化传播业的发达，为新的思想、学术之间彼此的炫技和斗法提供了可能的舞台：伟大的舞台造就了伟大的演员。

在现代的大学中，如果说大楼是基础、大师是灵魂，那么大舞台就应该是机制——它意味着研究冲动的促动、言说欲念的激发、交流碰撞的实现。在这样的机制中，精神、灵魂得到孕育！思想、学术实现成长！大学本身就应该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一个为大师成长提供基础和机制的场所。因此，大学出版自己的学术文库，运用现代传媒、现代出版为自己的教师提供思想碰撞、学术交流的平台，其意义绝不仅限于资金的支持和个人成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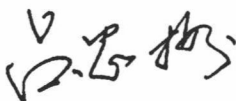
发表，它的意义更在于通过这种方式营造学术氛围、彰显学术精神，在学校形成言说、表达、交流的习惯和风尚，激励教师为了“台上一分钟”，做好“台下十年功”，凝聚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风格。

湖北经济学院是一所年轻的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的教师大多都还年轻，正逢为一所初创不久的大学承担奠基、开拓之责的难得人生机遇。我们中还没有大师，或者说在我们这里产生大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不期待大师的产生，更不意味着我们不去为大师的成长做出努力、不去为大师的产生构筑平台。大师的成长是大学成长的永恒动力，对学术的追求是大学能够逾千年而长青的不竭源泉。现在，我们的平台也许还不够高，还不够大，但我们坚信：这个小平台也许就是未来大师的第一次亮相！因此，我们在这里鼓励每个人以充分的自信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在众声喧哗中更加大声喧哗，在交流与碰撞中实现批判、被批判与自我批判，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成长，收获乐趣，实现价值！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就是这样一个为大师成长搭建的交流与对话的平台。每一本著作，都是我们的教师在各自学术领域中富有心得而最想表达的内容——他们渴望得到承认，也不怕获得批评；他们充满自信地言说，也将谦虚自谨地倾听。

愿“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和湖北经济学院一同成长，愿它能成为一个大师初成的舞台，从中诞生出不朽的学术和永恒的大学精神！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



变译：独特的文化气象（序）

变译不可忽视

人类翻译活动始于变译，而非全译。变译作为尘封已久的翻译思想元素日益受人青睐，写入专著且不说，它正逐渐走进培养万千译才的教材和课堂，成为 MTI 等高级翻译人才必训的内容。

从足本全译到原创全作有一个连续统，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释、参译、仿作十二种非全译方法呈现其间，均可归入“变译”范畴。它们巧借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八大变通策略，重在抽汲内容，改造形式，摄取原作信息，以求译文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作为翻译的下级范畴，变译只是近年来才得到正视。国内外非文本因素对译者及其变译策略的作用虽有研究，且提出了种种理论，但变译理论比其更具操作性、概括性和原创性，更能指导具体的变译实践，解释各种变译现象。

变译是特有的文化现象

变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翻译行为，与后来的全译构成了译之双翼。全译是力求完整地输入异域文化，变译是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摄取异域文化，二者互补，共同传播世界文明。

同质文化是翻译的基础，异质文化是翻译的动力。人类有求新求异的文化本性，相异创造了各取所需的机会，也造成了难以全收的矛盾。有矛盾就有冲突，有冲突就得变通。在不能全译的条件下，变译正可以解决语际文化供需的矛盾。全译在词句之间施以转化，可以因难见巧，变译则多在句子层面之上施以变通，可以因难见智。变译要求译者更具文化内涵，更具广阔的文化视野和高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变译比全译要求更高，需要更多的智慧。

变译可丰富世界文化图景

文化是变译的管轨，对原语文本选择和变译策略的选择具有制约作用；反过来，变译对译语文化起着全译所不能的丰富作用。

文艺作品可以变译，非文艺作品更是常用变译。纵观古今，横看中外，普希金、歌德、鲁迅、林纾、吕叔湘等做过变译；《赵氏孤儿》、《红楼梦》、《孙子兵法》、《共产党宣言》、莎士比亚的作品等有过变译；严译八大名著都是变译，圣经不同变译版畅销全球，美国《读者文摘》在世界几大语言地区发行不同变译版本……凡此种种，均表明变译能在单位信息量上求多、传播速度上求快、交流效果上求好、人财物和时间上求省、交流目的上求有的放矢，借语言之凿壁而达文化之沟通，因此能有效地促进各国文化交流，进而编织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图景。

永中推出这部专著，意在探讨变译行为产生的动因，全面展示变译的文化价值和译语文化建构的积极作用，着力推进变译理论研究。身为导师和变译理论的提出者，我要向他鞠躬致谢。他开了个好头，相信译学界的好戏还在后头。

黄忠廉

2012 年秋

哈尔滨三语斋

自序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学界把翻译分为全译和变译两大范畴,使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更为科学,同时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但是,变译作为新的概念和研究范畴,学界对它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对它在文化交流上的特殊功效的认识尚待加深。进入 21 世纪,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是急需深入研究的领域。当代翻译研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将翻译置入文化语境去审视,特别是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和解释翻译作品是今后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因此从文化层面研究变译顺应了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本书把变译置于文化交流层面进行研究,探讨了变译的概念、变译的理据、变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变译的主体间性关系以及变译文体的适应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变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有助于更为科学地指导翻译实践。

本书在综述变译研究的现状,该领域尚需厘清和探讨的问题以及陈述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石之后,对变译概念的生成进行了历时考察,展示了变译概念的演进,区分并澄清了全译中的变通与变译中的变通的异同。随后探讨了变译与全译的关系,指出变译与全译共同构成了翻译的一体两翼,变译与全译不是二值逻辑关系,非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两者共同为跨文化的信息传播作出各自的贡献。

厘清变译概念及其与全译的关系后,本书认为变译存在的理据在于英汉文化的差异。通过梳理纷繁的文化内涵,本书从中英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差异来分析变译存在的合理性:文化差异引起翻译障碍,而变译正是克服文化障碍,保证跨文化交际成功的方法。在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严重入超的情况下,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整体上还有差距的情况下,变译能多、快、好、省地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和西方先进有用文化的对内输入。

随后本书重点阐释了变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即变译对译入语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功能和特定文化对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制约。首先通过论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梳理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化学派各种译论,指出这些译论同国内提出的变译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

强调文本外围因素对译者及其翻译策略的影响和制约,但变译理论更具有操作性,更能具体指导实践和解释各种翻译类型。然后具体从译语读者、译语伦理道德和译语情景语境三个角度探讨变译受制于文化;再从中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中的变译实践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来探讨变译在促进文化交流和发展上的作用。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繁荣需要更多更好的变译实践,同时变译实践对译语社会的文化发展又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在促进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变译同文化有互动关系;接着以林纾的变译为个案,印证和回扣变译同文化的互动关系。

变译和文化的互动需要人的参与,因此在文化视角下探讨变译主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可以深入细致地揭示变译的生成和意义。由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当前翻译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领域之一,而变译属于翻译的一个范畴,故先探讨翻译的主体和主体性,再从变译实践中归纳出变译所涉及的三个主体:译者是变译主体,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阅读主体。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译者主体性和变译者主体性的定义,然后详细论述了变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并探讨了变译实践中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具有互动性的视域融合关系。认识变译的主体和主体性,在理论上可以消解译者主体性长期被遮蔽的状态,为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提供理据。同时,通过对变译主体间是视域融合关系的探讨,在理论上避免了在翻译实践中变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

鉴于翻译学界在变译对象的范围上还存在模糊认识,本书以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中外变译事实为基础,从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两个角度对变译文体适应性问题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对对外宣传、科技文献、经贸旅游等文体中的变译考察,可以印证和探讨变译文体适应的宽泛性,以期在翻译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变译方法来多、快、好、省地吸收外来文化和对外宣传中华文化,达到更好的跨文化交流目的。

本书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变译理论的创始人、翻译界著名学者黄忠廉教授的指导。同时作者也阅读参考了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译例,在此向黄忠廉教授和本书中所用引文的作者表示真挚的感谢。

本书获得湖北经济学院学术专著基金资助,在审稿、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湖北经济学院外语学院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以及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愿本书能在深化和完善变译理论的体系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变译在文化战略上的重要性。由于笔者能力有限,书中不足之处恳请学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变译研究现状概述	1
1.2 研究的意义	3
1.3 变译研究的基本方法	3
1.4 变译研究的理论基石	4
1.4.1 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	4
1.4.2 哲学阐释学理论	9
第二章 变译概念阐释	20
2.1 变译概念历时考察	20
2.1.1 翻译中的变通	20
2.1.2 变译概念的形成	24
2.2 变译与全译的关系	28
2.2.1 全译观念形成探因	28
2.2.2 变译观念形成探究	29
2.2.3 变译和全译：翻译的一体两翼	30
第三章 英汉文化差异：变译的理据	33
3.1 英汉文化内涵探析	33
3.1.1 西方对文化的界定	33
3.1.2 国内对文化的界定	35
3.2 从文化的三个层次看变译理据	36
3.2.1 从中西物质文化差异看变译	37

3.2.2 从中西制度文化差异看变译·····	39
3.2.3 从中西心理文化差异看变译·····	43
第四章 变译与文化互动论 ·····	47
4.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47
4.2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缘起·····	47
4.2.1 翻译文化转向的外因·····	48
4.2.2 翻译文化转向的内因·····	49
4.3 西方文化派译论与国内文化翻译观的兴起·····	53
4.3.1 西方文化派译论梳理·····	53
4.3.2 国内文化翻译观的兴起·····	59
4.4 变译受制于文化·····	66
4.4.1 受制于译语读者的阐释·····	72
4.4.2 受制于译语伦理道德的阐释·····	72
4.4.3 受制于译语情景语境的阐释·····	73
4.5 变译促进文化交流和发展·····	76
4.5.1 第一次翻译高潮变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77
4.5.2 第二次翻译高潮变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79
4.5.3 第三次翻译高潮变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81
4.5.4 变译促进文化交流的特效·····	83
4.6 林纾变译的个案分析·····	94
4.6.1 林纾及其翻译生涯·····	94
4.6.2 林纾变译概述·····	95
4.6.3 林纾变译的因由·····	95
4.6.4 林纾变译作品对译语文化的积极影响·····	100
第五章 文化视角下的变译主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	101
5.1 变译主体研究的必要性·····	101
5.2 翻译主体和主体性·····	101

目 录

5.3 变译主体和主体性	108
5.3.1 变译主体	108
5.3.2 变译者主体性	110
5.3.3 变译者主体性的个案分析——以《哀希腊》为例	115
5.4 变译主体间性论	121
5.4.1 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的缘由	121
5.4.2 变译主体性的黄昏	121
5.4.3 变译主体间性的黎明	124
5.4.4 变译：走向主体间性的视域融合	130
第六章 变译的文体适应论	139
6.1 探讨变译文体适应性的缘起	139
6.2 文学作品的变译考察	140
6.3 非文学作品的变译考察	144
6.3.1 对外宣传中的变译	145
6.3.2 科技文献中的变译	154
6.3.3 经贸旅游中的变译	157
第七章 结束语	171
参考文献	175
后记	185

第一章 绪论

1.1 变译研究现状概述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向文化转型,人们开始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丰富了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国内外的一些著名翻译理论家以及翻译研究学者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在著作中从不同的视角论述探讨了翻译中一些不忠实于原作的现象,如周兆祥的《翻译与人生》(1998)、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和《翻译研究新视野》(2003)、方梦之的《实用文本汉译英》(2003)、许钧的《翻译论》(2003)、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等等;或把“不忠”于原作看成是受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文本外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产生制约的结果,如国外的著名翻译理论家 Andre Lefevere (1992) 的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Gideon Toury (1999) 的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Luise von Flotow (1999) 的 *Translation and Gender*、Christiane Nord (2000) 的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和 Bassnet & Lefevere (2001) 的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等等。国内外对翻译“不忠”于原作现象的研究,有些虽为感性,却是理性升华的前奏;有些虽缺乏系统性,却为变译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起点;有些虽还缺乏理论深度,却为变译研究的系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前人的基础上,黄忠廉通过其三本专著《翻译变体研究》(2000)、《变译理论》(2002)和《科学翻译学》(2004),将翻译实践中的各种翻译变体和变通手段条理化、系统化,提出了“变译”这一核心概念和十八个基本概念及其逻辑关系,这基本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变译理论,该理论总体上研究了变译系统由变译主体、变译客体和变译中介构成;变通手段包括

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构成了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释、参译、仿作等变译方法；变译以句群为中枢单位；变译机制表现为读者→译者→变通→原作；变译突出原作的使用价值，满足读者的特殊需求，追求翻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变译概念提出以来，引起了翻译界的广泛关注：翻译界著名学者许建忠（2000）、许钧（2002，2003）、杨自俭（2002）、方梦之（2002）、郭著章（2003）、郑海凌（2004）、文军（2004）等撰文认为，变译理论的提出是顺应时代呼唤的产物，是翻译观的革新，使我们对翻译问题看得更清楚，有利于指导实践，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值得深入研究完善。也有不少学界同仁在学术期刊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变译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如许美华（2003）《“变译”之我见》、贾洪伟（2004）《〈变译理论〉展读》、徐朝友（2006）《〈变译理论〉的两大问题》、周领顺（2012）《“变译”之名与实》等，或在学术会议上对摘译、编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译写、阐释、参译、仿作十二种变译方法的界定或区别等问题进行了商讨，虽然少部分评论并不是在基于认真读懂变译理论基础上给出的，但大部分意见对丰富变译体系和促进变译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肯定，毕竟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只有在不断的改进中才能日臻完善。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不完全的文献检索统计，2000—2012年间，有约210来篇学术文章以变译为主题；全国约100篇优秀硕士论文以变译理论为理论框架；有四篇博士论文涉及变译，可见变译理论在学界正被人们认识，关注度也较高，正在摆脱谈翻译理论只搬运外国理论的单一做法，也正在改变“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我们基本上还在‘照着说’和‘接着说’，缺少‘自说自话’的意愿、信心和能力”的现状。（参见杨武能，2009）

然而综观变译概念及其理论提出以来所有涉及变译的学术文章，大部分是运用变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或解释翻译实践中的一些翻译现象，即拿来运用的多，帮助改进的少。虽然变译在国内学者的讨论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但变译体系尚未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1）变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2）变译主体和主体间性关系；（3）变译文体适应性问题等。此外，变译理论对变译的概念以及变译和全译的关系上论述阐释得还不够清晰全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变译概念和变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有助于更为科学地指导翻译实践。

1.2 研究的意义

鉴于变译及其体系是在各国间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背景下提出的,本书把变译纳入文化视野下,用描述性翻译理论和当代哲学阐释学作为理论基石,深入系统地探究以上几个宏观问题,以期对变译概念和变译的社会功能有深入的认识。由于“变译”确立了新的翻译研究对象,深化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同时变译是典型的文化之译,所以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把生发于翻译实践土壤并汲取了我国传统译学养分的变译体系丰富完善起来,使它像全译一样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通过本书的研究,揭示翻译不是静态的语际转换过程,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受译语文化语境制约的,译者、读者、作者等主体积极介入的一种动态的语际转化过程。变译研究和全译研究共同构成了翻译研究的一体两翼。对变译研究的深入有利于推动变译体系的逐步完善,这对于建立一套我国自有的译学理论体系,对于在翻译研究上获得独立的“自我”,走出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简单介绍或搬运式借鉴研究模式,在世界译坛上发出自己的译学话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3 变译研究的基本方法

邢福义(2008)认为,任何理论,都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为了理论的不完善,必须步步逼近地让理论贴近语言事实。也就是说,要使理论不断完善,就须遵循“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的研究原则,套在翻译研究中就是“译论研究须植根翻译泥土,理论须生发于翻译事实”。笔者遵循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提倡的这种研究原则,通过对翻译实践中变译事实的发掘来详细探讨变译。

文化视野下的变译研究是在哲学阐释学和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基石上,对变译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变译的理据、变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变译的主体及主体间性以及变译的文体适应性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对变译的研究主要采取如下方法:(1)文化透视法: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外变译作品如何变通原作,以达到吸收外来文化的目的和满足特定文化中接受主体的显性和隐性要求;(2)田野调查法:考察政府对外宣传部门、工商企业、外事部门等的变译语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此外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 认为, 翻译学实质上是一门经验学科, 经验学科通常采用观察、描写和解释的研究方法。因此, 为保证课题研究的科学性, 笔者遵循研究的“三个充分”要求, 对变译实践语料做到: 第一要观察充分, 只有充分的观察, 才有充分的了解; 第二要描写充分, 只有充分的描写, 才有充分的反映; 第三要解释充分, 只有充分的解释, 才有充分的认识。(参见邢福义, 1996)

1.4 变译研究的理论基石

任何对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标准以及目的语文本同原语文本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在理论的支撑下进行, 从而避免随感式、经验式的论述和由此而得出的不科学的论断。本文对变译的文化研究是建立在翻译的描述性理论和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基础上, 力争对变译现象进行客观、细致、辩证的研究。

1.4.1 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

1.4.1.1 翻译研究从规范转向描述

中西方的翻译实践史到现在已有 2000 多年, 在这漫长的翻译实践与研究中, 大致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 (1) 以原作为中心的文艺学或称语文学研究范式; (2) 以文本对照为中心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3) 以译者和译入语读者和接受环境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范式。前两种都属于规范型研究范畴,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特点是, 定出一个让所有翻译者都必须遵循的翻译规范或标准, 如 18 世纪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 翻译理论家 Alexander F. Tytler 在 1790 年出版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 提出翻译实践必须遵循三大原则:

(1) 译作应完全传达原作的思想。(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 译作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的一致。(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3) 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参见陈宏薇, 2006)

可以看出泰特勒的三原则在本质上是规定译者必须以原作为中心, 必须在译语中复制出一个精确的原文, 才能称为优秀的翻译文本。

1898年中国晚清翻译大家严复根据多年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被后人奉为圭臬的翻译质量评估标准：信、达、雅。这三字经一百多年来一直成为翻译者努力达到的目标。按照传统的解释，所谓信，就是要在内容和风格上忠实于原作；所谓达，就是用流畅明白的语言进行翻译；所谓雅，就是用汉以前的文言文来进行翻译，在修辞和诗学上体现译文的美学价值。比较严复和泰特勒对优秀翻译的评估标准，可以看出，严复的“信”相当于泰特勒的第（1）和（2）项原则，都强调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严复的“达”相当于泰特勒的第（3）项原则，都强调用流畅而非晦涩的文笔进行翻译，严复的“雅”是在100多年前提出的，是为了迎合士大夫喜欢阅读“先秦子书的风味”（罗新璋，1984），从而使其翻译的作品能被当时的士大夫们所喜爱和接受。从当代译学的观点来看，“雅”字的翻译标准是不对的，若原文不雅，硬用文雅的语言来翻译的话，就违反了原文的风格或内容而与“信”相矛盾了。

泰特勒和严复的规范性翻译原则对中西方后来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影响很大，几乎成为统摄整个翻译实践过程的指导原则。在这种规范性的指导原则下，翻译研究局限于原文与译本的对照，以及探讨双语转换的机制和规律。这种侧重于翻译本体内部的、封闭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应具有社会属性的特点，忽视了翻译是存在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的事实。由于长期以来，规范型的翻译研究占据统治地位，许多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忠于原文的翻译作品或文本得不到合理的解释，阻碍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翻译研究由规范型转向描述型翻译研究或两者并存共同成为翻译研究的方法就成为一种必然。

描述性翻译研究是指“在人们研究翻译过程、翻译译品，以及翻译功能时，把翻译置于时代背景中研究。广义上讲，就是把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等文本外的背景下研究”。（Tymoczko, 1999）也就是说，描述性翻译研究打破了规范型的注重双语文本对照式的对比研究，不再仅仅把目光聚焦在微观的双语转换的机制上，也不再制定孰优孰劣的翻译评估标准，而是从宏观的角度把翻译成品看作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现象的产物，注重阐释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制约，或特定译作对当时译入语文化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以及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关系等。

1.4.1.2 描述性翻译研究简介

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 1999）在《系统中的翻译》（Trans-